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治理逻辑

■吴南中 李少兰 陈恩伦

摘要:教育治理体系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制度载体和机制保障。中国教育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现代化需求,亟待建构与之适应的治理规则、程序和秩序。根据教育治理特性,在主体的多元化、对象的复杂化、治理方式的多样化和治理维度的层次化等为一体的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框架下,将治理作为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存在,分析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治理内容,包括了以解决主要矛盾为目标的资源治理,以落实“自我革命”为方式的制度治理,以优化行动网络为支撑的组织治理,以立德树人为载体的内容治理和以主体活力释放为保证的评价治理。按照治理理论的经典框架,追求形式上的贯通和实质上的联动取向,建构包括有信任治理行动网络的治理主体、适配中国教育情境运行机制的治理方式、追求有质量治理秩序的治理效果为要素的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治理运行架构,旨在实现有信任、有活力、有质量的中国式教育治理,为世界教育治理提供新的方案和类型。

关键词: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治理制度;治理组织;治理内容;治理逻辑

基金项目:数字化学习技术集成与应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创新课题“历史主义制度下欧盟数字教育转型的政策支持和效能观照”(编号:1221038)。

中图分类号: G40-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311(2023)03-0012-08

作者简介:吴南中,男,教育学博士,西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李少兰,女,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江西南昌 330036);陈恩伦,男,教育学博士,西南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 400715)。

DOI:10.16477/j.cnki.issn1674-2311.2023.03.010

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节点,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新高度和实践推进的新指南。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范畴,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基础性支撑。教育治理体系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制度载体和机制保障,探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问题,不能回避中国教育从“管理体系”完善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命题。文章尝试明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治理诉求,梳理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治理价值、治理特性、治理内容与治理运行架构等,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高效”转化为教育治理所追求的“更好的教育”为指向的“善治”,发挥治理效能,服

务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和教育现代化,形成一种有信任、有活力、有质量的现代化新秩序。

一、教育治理内涵及其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中的治理诉求

(一)治理与教育治理

治理是在福利国家危机、全球化等现实挑战中形成的概念,其核心主张包括:去中心化、多主体共治、反对纯粹市场并认同多要素组合、多层次治理和多工具的使用以及政府与公民角色的变化^[1]。其整体作用思路是包括形成一系列基于治理理念的规则,实施以调和为基本方法的治理活动,通过整

体域的关系性调整,实现多主体相互依赖和可持续发展的相互作用。教育治理指的是治理理论在教育事务中的应用,指的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利益群体和公民个体,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进行合作互动,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的过程”^[2],是教育主体在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中,通过协商、联动与对话,实现资源调配、制度建构、日常事务和权力运行中的整合过程,包括结构、过程、关系、程序和规则的体系性活动。教育治理作为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话语标识,包括了思维方式、运行架构和文化价值等在内的话语叙事,形成了多元参与、过程民主、结果反馈等优势,建构了“治理”体系的鲜亮底色,受到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形成了“纵向多层”和“横向多元”的治理图景^[3],并在治理制度建构等理论探索和教育公平治理^[4]、教育质量治理^[5]、区域性治理^[6]、数字化治理等领域^[7],形成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

(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治理诉求

1.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才培养需要教育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在于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8]。从教育的现代化功用来看,教育是培养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是科技竞争力的基础,也是国家创新能力的最根本来源。教育治理通过多元主体在教育公共事务中的参与,在强化联系、观念冲突和利益调和的过程中,开展持续性的联合行动,引导更多人服从对绝大部分人有利的正式制度,形成以质量不断提升、意志更加坚定、创新能力更强、更能培育科技竞争力的人才为目标的制度体系,引导和实施教育教学的现代化改革。

2. 教育治理是保持教育现代化活力和秩序的必然要求。活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组织的改革核心就是让一切生产要素实现活力迸发。中国的选择是依靠机制体制的改革,比如经济活力的激发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教育现代化的活力也是通过教育机制体制改革来实现,主要方式是治理制度的建设,使教育围绕人民需求开展教育资源的调配,发挥多元主体在教育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3. 教育治理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和当然底色。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涵盖14亿人口的现代化,是教育类别齐全、教育种类繁多、教育发展不平衡等现实条件上的现代化。教育治理就是党和国家运用治理理论、制度和方法实现以“更好的教育”为目标的“善治”,其中共产党的领导、多元参与和制度优势是重要的标志。共产党的领导相对于普遍意义的治理而言,可以规避泛在的权力散乱问题所导致的方位聚焦不够、资源集中难度大,是中国式治理的定力,保证资源的覆盖面广。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教育利益得到保障;多元参与是治理的本质特征,共产党的领导通过民主制度的建设,有利于多元群体在教育治理中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制度优势重在教育治理的执行力和反馈力,教育领域的深化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如何在保证立德树人的前提下,逐步提升优质资源的覆盖面、减少城乡差异、服务特殊群体等都需要强大的执行力和完善的反馈体系来支撑。

(三)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治理特性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基于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形成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等五个中国式现代化特征^[9],将人的主体性,发展的全面性和生存的关联性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思想的“进化论、多元论、主体论、区域论”等现代化视角的超越^[10],形成了融合“时间、空间、价值”为一体的现代化理论分析框架,包括了如下五个特性。

1. 面向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状况。从治理的角度来讲,中国十四亿多人口意味着治理的主体增加、需求复杂、任务艰巨。从空间来看,既有城乡差异、东西部差异,又有区域优质学校和发展中学校的差异,受限于环境、条件和治理能力,无法用一刀切的方式来推进多类学校的治理问题;从层次来看,既有接近甚至超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教育,也有刚刚脱离“两基”评估的学校,甚至还没有完全达到“两基”标准的学校,在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上存在显著的“代差”;从微观个体来看,既有特色鲜明、错位发展的学校,也有整齐划一、标准建设的学校

等。脱离了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环境谈治理,容易陷入教育的“乌托邦主义”。

2. 服务优质教育资源全民共享。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1]。转译到教育领域则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也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追求,也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特色体现。与共同富裕问题一样,优质教育资源的整体有限,导致很长时间内难以实现共享。因此,教育治理需要紧扣人民对高质量教育的追求,将全体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的根本出发点,从教育规模、教育质量和对经济发展、乡村振兴、国内国际“双循环”、学生全面发展适应性等方面形成充分发展的治理机制,在治理中逐步将现代化的理念转化为教育治理的实践。

3. 服务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不能陷入“唯经济增长”的早期现代化纲领;也不能陷入“唯自我满足”的极致个人中心,而是追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高度协同,帮助学生在寻求社会进步中满足自身诉求。落实到教育治理,就是要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治理的追求,全面落实“三全育人”和“五育并举”,以核心素养为指引,在塑造“六个下功夫”“思想政治课主渠道”“家校社协同育人”等多种途径上的良好生态^[12],形成既关注学习者外部适应,又关注自身身心健康的教育;既形成支持社会发展能力,又搭建个体适应和认同的内在知识架构,服务学习者的全面发展。

4. 服务人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阐述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3],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方位。迁移到教育治理,就是要围绕可持续发展建构和完善教育治理体系的可持续能力。可持续发展作为“能培养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增值以及和平共处所需的正确价值观和技能”^[14],已经在全球引起高度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GAP计划”等推进可持续发展教育^[15],核心聚焦于两个角度:一是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为人人能具备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的整体学习和教育架构;二是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过程中,强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5. 服务和平发展道路的治理。中国式现代化

是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价值引领下,在与合作世界互动中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落实到教育领域,需要通过治理,在组织上强化开放的教育模式,通过系统的制度建设促进教育互鉴和学生共育,为全球化治理提供人才培养模式支持;在内容上强调气候变化、协同减贫、生物多样性、和平发展等内容的持续参与和迭代优化;在能力上强调社会参与、技能提升和共情能力等具身行动,在实践中获得理解世界的能力,进而迭代优化政治生态。

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治理范畴

治理是将国家视为兼具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的组织,是以社会团结为特征的、追求秩序为第一要义的组织架构和互动博弈场域。简言之,是通过国家权威来充分发掘、努力汲取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推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16]。落实到教育治理,其本质就是要面向教育实践问题,解决国家教育资源的均衡建构问题,形成一个包容性的教育体制,系统性地回应复杂现代化所导致的教育变量调整的问题,可以细化为以下五大范畴。

(一)以解决教育主要矛盾为目标资源治理

治理体系的选择和坚守通常是由生成治理体系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基于主要矛盾的解决需求,建构一套关注矛盾解决的治理规则、程序和秩序,形成解决教育主要矛盾为目标资源治理,是治理的首要因素。当前我国教育的主要矛盾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公平、优质、美好的教育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教育发展之间的矛盾^[17],本质是教育资源的投放不均衡,难以在规则上满足不同主体对高质量教育的诉求,实现超越“机会平等”的“规则平等”。因此,围绕教育主要矛盾的解决,以“属性”“品性”“特性”为追求,实施包括物质资源、文化资源、制度资源、人力资源等一体的教育资源调配,在学校布局、类型规划、发展定位、资源投入、人力保障、特色塑造等形成一系列多元主体参与的运行机制,确保有限的教育资源在保证整体效率提升的基础上,向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学校、类型倾斜;确保全民充分共享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提高教育普及普惠范畴,反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二)以落实“自我革命”为起点的制度治理

治理的核心是治理规则、程序的建设,制度是作为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治理体系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基础^[18],制度既是治理的目标,也是治理的方法,关键在于“自我革命”的落实。“自我革命”的要义是“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19],是中国共产党研究“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得出的答案,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方法论。首先,通过“自我革命”,实现以公平为取向的制度建设。“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就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20]从制度角度来看,教育治理的“正义”就是建立符合广大民众对高质量教育追求的资源和权利分配制度,把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其次是通过“自我革命”,实现以开放为取向的制度建设。具体体现为将广开言路作为制度建设的基本出发点,通过开放不断提升环境调整能力,形成灵活的教育治理体系,使整体系统能快速接受新事物、新思维、新理念。再次是通过“自我革命”,实现以科学为取向的制度建设。制度是否符合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服务组织和事物高质量的发展,是衡量制度是否科学的关键。制度治理要将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主权等应然性和日常治理事情处理的应景性结合,形成彰显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制度体系,促使多元主体回到“义利统一”和“和而不同”。最后是通过“自我革命”,实现生态取向的制度建设。“治理”所面向的对象是全体事务,既有公共事务,又有私人、个体和组织事务,只有坚持了生态规律的制度,才能在生态中逐步成长;也只有形成了系统生态,治理才能发挥好自身的作用和价值,实现保障教育科学运动的支撑。教育生态规律主要体现为教育节律、整体关联规律、动态平衡规律、富集规律、耐受最适度规律等方面^[21],生态取向就是在遵循这些规律过程中,完成契合的整体制度生态的建构与运行。

(三)以优化行动网络为支撑的组织治理

“组织作为操作程序和运行结构的结合,因拥有自身利益,并捍卫规制的影响力,形成了自身的特征。”^[22]基于此,杰普森强调制度理解的相对性,并将组织作为“基本的层次安排”进行了定位^[23]。优化

行动网络,使之成为治理体系中权力流动的“循环网”“分配网”“共享网”,强化对治理运行体系的支撑。首先,建构多元主体参与的教育治理行动网络。多元主体参与是治理的当然之义,也是治理网络发挥作用的主要手段,首先需要明确教育治理的行动者。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看,行动者包括人类和非人类,其中非人类行动者被赋予了动态意义,使人和物的动态联系,形成网络,进而去跟踪和解释世界^[24]。在行动者中,最为重要的是核心行动者,通常为问题的发现者和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发起者和组织者^[25]。在教育治理中,国家机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媒体等都是重要的行动者,同时还包括数字化技术、各类教育资源等,他们之间通过治理活动发生关系,明确身份和职责,形成联动的治理网络。其次,建构权力的转译体系。权力的分配方式不当,会导致转译体系的混乱,比如赋予学校人事自主权,却缺少人事监督的组织和制度,会导致系统的整体混乱。行动网络体系的建构需要以强制通行点的打通作为核心的权力流动系统,关键在于落实以各级党委的领导体系和各级纪委的监督体系,形成清晰的转译脉络,支撑权力的流动。最后,将联结作为核心,重新梳理教育行动网络。教育治理需要将中国式教育理论体系及其话语作为联结的基础性资源,并通过资源的内在转译含义,完善新的行动网络所造就的“新教学过程”,实现联结。比如人工智能嵌入的教育教学就包含了行动主体、过程和结果的转变,同时也对治理网络的建构提出了以人工智能机器话语逻辑的新体系建构的要求,需要得到权力的支持,比如数据的获取权、算法的应用权等,在这个过程中,也就完成了行动者之间的联结。

(四)以立德树人为载体的内容治理

在过往对治理的探讨中,更多聚集于权力的配置机制。尽管有学者就教材的治理^[26]、课程治理^[27]、教学治理^[28]、教育评价治理^[29]等具体的治理进行探讨,但鲜有将教育内容作为治理体系建构的范畴。内容治理通过多主体的介入,特别是对专家学者、社会 and 家长的参与,对于全面建构“公平而有质量的互释互构”教育行动具有积极的意义^[30],体现为能为性别、区域、德性主张、培养人的定义等形成“人

民的声音”。首先,将“立德树人”作为治理的价值主张,引领内容治理。在回答“培养什么人”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个服务”的价值导向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主张^[31]。这是治理运行所需要转译的价值导向。其次,将“立德树人”的落实,作为教育内容治理的核心。“立德树人”是内容选取的“金标准”,将“什么知识更有价值”的问题转化为如何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和谐发展的特色与要求的问题。选择与“立德树人”同频共振的内容,形塑现代化的教育,并以此为标准,形成一股监督的力量,从体制上规避了资本主义腐朽的价值观和功利思想侵入的可能性。再次,将“立德树人”的效果,作为改进治理的依据。治理的优越性在于问责体系的执行力^[32],换言之,治理的推进是需要对所服务的对象负责的。通过对内容的治理,实时评价包括教育公平、教育效率和教育质量在内的立德树人体系的成效,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的思路,完成依靠人民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内容演进实践。

(五)以主体活力的释放为保障的评价治理

中国式现代化的意涵需要通过主体活力的释放来保障,治理的评价需要按照主体活力是否得到保障来定性。首先,只有通过治理评价优化权力配置,规制和引导政府从“包揽”全面转向“服务”。治理的起点是政府权力的下放和运行的制度是否合理,对治理的准确评价才能激发政府这一行动主体的职能,促使政府做到“不缺位、不越权”。其次,只有通过治理释放了学校的活力,深化改革才能推进。在中国教育改革中,存在“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33],核心原因是对不太重要的内容放权、放权不彻底导致政府职能不清、学校主体地位不明等^[34]。治理需要确保该放的权力必须放,判断的直接标准是能否将教育办学权交给学校,让学校成为自身改革和发展的能动体,真正实现活力的释放。再次,只有通过治理释放了个体的活力,才能真正形成适应自身的“立德树人”之路。“立德树人”不是空洞的标准,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治理成品”——人来体现的。人的自由发展、全面发展、科学发展和自适应发展等相关的治理评价,才能促使教育体系围绕“人的发展”开展治理工作。

三、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治理理想运行架构

在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下,课题组尝试建构形成蕴含规则和程序的现代教育治理运行体系,其核心是按照治理理论的经典三要素架构,实现尝试从要素建构的基础上实现治理运行架构的形式上的贯通和实质性的联动,实现教育治理特性的融入和教育治理内容的实施。

(一)治理主体:形成有信任的治理行动网络

1. 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障治理主体的共同意志。治理并不是完全依托主流意识,也不是摒弃权威。“没有权威就没有治理。”^[35]恩格斯也明确指出:“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36]“坚持党的领导、人民中心、依法治国”是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运行三大支柱,已经是40年改革开放实践证明的原理^[37]。在中国式教育治理体系的建构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顺应历史和环境、人民与时代的治理方位保证,也是中国治理体系建构的理论自信的源泉。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语境中治理的目标是服务人民高质量的教育要求,是紧紧围绕人的发展开展的系列化工作,体现为从权威源头上确定中国共产党对教育的领导和治理体系的依规治理、依程序治理。

2. 以形式完善促进网络系统的权力顺利分解实现。在教育治理中,个体意识、集体意识和社会意识都能影响教育的最终决定,也是体现权力来源的重要方式。一个稳定的治理体系,是有效协调教育资源和处理教育领域问题的重要保障,这就需要借助多元主体,以更好的教育为目标,形成完善的主体行动网络,实现对教育科学性、实践反馈等治理信息载体的有效转译,最终帮助形成有效的治理系统。

3. 以治理过程强化行政与非行政在决策中的合理性。治理的优越性在于管理层向利益相关群体的放权,本质是将行政权力进行合理分配,促使政府在管理过程中聚焦于自身的角色,并听取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使教育运行体系超越行政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局限性,实现个体、集体和社会的共同进步。因此,教育治理过程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题:一是有效参与;二是有效执行。有效参与的关键在于治理的合理性、合法性和程序性,既要规避行政主体的权力集中,又要避免民主争论的喋喋不休,使过程保持在有效和有序的平衡。有效执行体现为群体支持和资源的调配到位,体现为治理中权力的落实。

4. 以信任为履带实现治理主体的合作形成。教育是重要的公共事务,具有复杂性、系统性、非线性发展等特性,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快速普及,为教育治理提供了便利工具和数据的同时,也极大扩大了治理的参与面。“生存环境的信息越复杂、庞大、不完备,决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更大,需要通过信任的建立,完成主观和偏见的简化”^[38],为协同事务做出调整。要形成协同效应,就需要以信任为履带,“通过信任对人民行为的一定程度的控制,为社会秩序作出贡献”^[39],完成组织行动网络的构建,实现以共同行动网络的合作组织形成。

(二)治理方式:建立适配的治理运行机制

从治理体系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意识、国家权力约束机制、机理监督机制的共同约束和中国式现代化意涵的整体情况来看,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治理方式至少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1. 教育治理运行机制的民主化。民主是保证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广、共享程度高的基础,失去民主的运行机制难以广泛充分考虑各个方面的利益诉求,容易为公平与质量互释互构的教育治理形成障碍,与治理理念背道而驰。运行机制的民主性就是将利益分配和权力分配的整体性通过合理的对话机制来整体把控,保证在体系内的受教育者的潜能最大限度开发,并形成未来幸福生活的能力准备。

2. 教育治理运行机制的法治化。教育治理的推进过程中,通过显性的制度建设和隐性的规则建设,逐步形成了可以物化的规范条文,比如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限、高中阶段的职普分流等,这些问题的治理逐步形成法律条文的形式,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的意志。

3. 教育治理运行机制的文明化。有治理的隐喻其实是有冲突、有利益诉求、有资源分配不均的。治理就是旨在文明、为了文明、过程文明利益

协同的过程,需要将理想认知凌驾于内在利益的评估之上,摒弃狭隘的区域主义、阶级主义、民族主义、逆全球化等观念,将“教育使人幸福”的共同价值观贯彻于治理的全过程,形成文明化治理。

4. 教育治理运行机制的科学化。教育治理本质是内蕴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国家行动,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组织行动,是体验和揭示群众与国家依存关系的具体途径。需要将教育提高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能力范畴,这就要求治理不能是脱离现实的主观臆断或者是环境所形成的应景性决策,而是在深度反思教育重大问题和现实资源的把控中形成科学合理的治理过程,对治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立德树人的立场与原则的科学性要求,强化思想体系中的理念贯彻以及治理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

(三)治理效果:实现有质量的治理新秩序

在治理的运行架构中,治理主体的网络建构旨在形成规范性的治理组织,治理过程旨在保障权力运行的能力。而在整理运行的过程中,治理效果作为反馈机制的环节,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优化及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教育治理体系对外部世界变化回应的具体方式。

1. 建构可持续发展的反馈体系引导治理生态演进。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制度文本,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可持续发展知识、技能和价值观的形成,主要是学习者对环境做出明智判断和负责任的革新;二是接纳文化多样化和持续发展;三是夯实“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和学会生存”等四大教育支柱。可持续发展是引导教育治理建立长期能力观的有效方式,是服务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内容,对于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蕴含的全面发展、和平发展等特性的实现起主要支撑作用。

2. 建构治理改进的反馈机制引导治理能力提升。治理体系是依托,治理能力是支柱,治理体系的效用发挥需要治理能力来支撑。因此,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整体架构中,需要强化治理效能评价的机制建设,通过信息公开、意见收集、组织讨论等形式,形成一种旨在为教育治理纠偏的纠正机制,实

现治理能力的逐渐提升。治理改进的反馈机制在另一维度体现为在实施层面提升参与度的问题。教育治理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而效果监督却门槛很低,其黄金标准体现为人才对社会的有用性,这就为不同利益群体的系统参与提供了基础。

3. 建构指向持续稳定的反馈机制促进治理结构生成。教育不同于经济活动,教育所面向对象的长期性需要治理的稳定性来提升。治理的稳定性反馈指的是教育不能“瞎折腾”,也就是保持治理的运行结构,实现治理的整体方位不发生改变。至少包括三个维度:一是治理的指导思想相对稳定,比如现阶段强调治理围绕立德树人开展治理;二是治理的运行规则相对稳定,具体指在运行过程中的组织程序来开展分权、共治和自治,旨在通过结构来保证运行的相对平稳;三是治理的目标愿景相对稳定,包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功能性目标,全人发展的个体发展目标,公平而共享教育的整体性目标等。

4. 建构活力激发的反馈关系促进治理主体激发潜能。“社会组织的活力指的是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生存、获得自身发展,并在多大程度上对满足人的需求和维系社会功能做出贡献。”^[40]在教育组织的活力影响因素中,治理关系的系统构建对教育各个层面的影响巨大。要保证治理的效果,需要围绕活力激发的成效进行有效反馈,将自主性、能动性、协作意识等拉入观察范围,将结论作为重要的反馈内容纳入运行机制的建设过程中,促使其深化中国教育治理的理性认同和自觉践行。

四、结语

转型阶段的中国教育在差异化、复杂化的社会作用下,形成了教育的复杂多元社会场域,给教育治理的实践推进带来了困难。一方面,理论工作者需要与实践工作者一起,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结合中国的传统因素和现实环境,建构完善的治理体系;另一方面,需要以提升参与治理的能力为目标,积极培育治理主体。同时,需要以复合思维来推进教育治理,比如借助现代化的数据技术工具,为治理提供数据链支持,也是推进治理的有效

保障,这是本团队尝试探讨的下一个话题。需要指出和强调的是,从现有教育体系来看,尽管治理理论在表面上广泛被教育工作者所认识并接受,但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一致性更多体现在工具层面,与基于学科理性的形而上学有极大的差异,需要教育治理的知识和实践来推动方法论层面的变革。

参考文献

- [1]王诗宗.治理理论与公共行政学范式进步[J].中国社会科学,2010,(4):87-100+222.
- [2]褚宏启.教育治理:以共治求善治[J].教育研究,2014,35(10):4-11.
- [3]褚宏启.绘制教育治理的全景图:教育治理的概念拓展与体系完善[J].教育研究,2021,42(12):105-119.
- [4]余应鸿,张翔.新发展阶段相对贫困的教育治理机制与行动路径[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8(6):176-184.
- [5]孙绵涛,何伟强,吴亭燕.国家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框架结构探析——基于教育政策内容分析的视角[J].大学教育科学,2022,(6):13-24.
- [6]卢威.治理视野中的长三角高等教育一体化:进展、困境与突围[J].大学教育科学,2022,(6):34-42.
- [7]杨欣.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利弊及其调适[J].中国电化教育,2022,(11):45-52.
- [8][9][11][13][19]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2-10-16]<https://www.163.com/dy/article/HJR74N9I05416ZVD.html>.
- [10]M. B. 鲍别列日尼科夫,许金秋,史旭超.现代化理论视角下的俄罗斯帝国[J].社会科学战线,2021,(9):127-133.
- [12]吴安春,姜朝晖,金紫薇,等.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学习研究之十[J].教育研究,2022,43(10):4-13.
- [14]UNESCO.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learning objectives[M].Paris:UNESCO,2017:7.
- [15]UNESCO Roadmap for Implementing the Global Action Programme on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Z].Paris:UNESCO,2014:14.
- [16]何增科.理解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1):11-15.
- [17]李冀红,万青青,陆晓静,等.面向现代化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方向与建议——《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引发的政策思考[J].中国远程教育,2021(04):21-30.
- [18]苏君阳.新时代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内涵、特征及其实现路径[J].教育研究,2021,42(9):120-130.
- [20]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
- [21]王凤产.试探教育生态规律[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8(4):249-251.

- [22]Olsen M J P.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4, 78(3):734-749.
- [23](美)沃尔特·鲍威尔, 保罗·迪马吉奥编. 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M]. 姚伟,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158.
- [24]LATOURET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M]. Hampshi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55.
- [25]欧阳忠明, 李书涵. 代际学习项目如何运行?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阈下的个案研究[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21, 33(2):84-95.
- [26]薛二勇, 李健. 教材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政策分析[J]. 中国电化教育, 2022, (7):16-22, 42.
- [27]郭一凡, 郑雅倩. 模糊信号与碎片化执行: 水课为何难以治理——基于层级治理视角的分析[J]. 中国高教研究, 2022, (10):35-42.
- [28]张育桂, 周雁翎, 卢翠.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中小学教学治理的框架与路径[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2(6):58-64.
- [29]陈星. 学术生产体系的工业化倾向及其治理思路——兼论教育评价改革的社会视角[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69-78.
- [30]李政涛. 中国教育公平的新阶段: 公平与质量的互释互构[J]. 中国教育学报, 2020, (10):47-52.
- [31]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EB/O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809/t20180910_348145.html.
- [32]鲁广鹏.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执行力研究[D]. 中共中央党校, 2021.
- [33]王一兵. 如何走出高校放权“一放就乱, 一乱就收, 一收就死”的怪圈[J].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6, 4(1):124-128.
- [34]周川. 从管理体制变革到治理现代化: 中国高等教育的时代命题[J]. 高等教育研究, 2022, 43(7):22-28.
- [35]陈进华. 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 (5):23-39, 205.
-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76.
- [37]陈进华. 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 (5):23-39, 205.
- [38][39]郑也夫. 信任论[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98.
- [40]关信平. 当前我国增强社会组织活力的制度建构与社会政策分析[J]. 江苏社会科学, 2014, (3):83-89.

The Logic of Governance in Chinese Path to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Wu Nanzhong, Li Shaolan & Chen Enlun

Abstract: The education governance system is the institutional carrier and mechanism guarantee for Chinese path to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The modernization need in China's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 urgently requires the tailored construction of governance rules, procedures and order.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framework of Chinese path to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that integrates the plurality of subjects, the complexity of objects, the diversity of governance methods and the hierarchy of governance dimensions, this study takes governance as an ont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denotation to analyse the governance content of Chinese path to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which includes resources governance with the aim of resolving major contradictions, institution governance in the form of “self-revolution”, organization governance with the support of optimizing action networks, content governance with the carrier of moral education, and evaluation governance with the guarantee of subject vitality releas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lassical elemental framework of governance theory, it is necessary to pursue the orientation of coherence in form and linkage in substance, construct the operational structu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governance with elements including governance subjects with trust in governance action networks, governance methods adapted to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Chinese education context and governance effects, seek quality governance order, so as to realize Chinese path to education governance with trust, vitality and quality, and to provide new solutions and type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world education.

Keywords: Chinese path to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governance system; governance organization; governance content; governance logic

责任编辑: 肖第郁